



老矿工走过的路

(纪实)

老矿工走过的路

(家史)

喻緒祁 插图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(长春市北京大街)

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16 统一书号：3091·143

印张：1¹³/₁₆ 字数：26千字

印数：1—35,000册

1964年5月第一版

1964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定价(3)：一角五分

告 讀 者

讀者同志們：

为了帮助大家能够生动具体地了解一些階級斗争的历史，提高自己的階級覺悟，树立坚定的階級观点，以增强在现实階級斗争中明辨是非的能力，我社要陸續編輯出版一些屯史、家史、社史、厂史的回忆材料。

看一看这些血泪的回忆，了解了解老一代（老工人、老貧雇农、老下中农、老共产党员、老革命干部）在旧社会的經歷，看看父兄們是怎样从旧社会的苦海里掙扎征战出来的。这对于我們提高思想有很大好处。他們是階級斗争的活的見証人，他們所写的和講述的回忆材料，是階級教育的活教材。

在反动階級統治的旧社会里，那些吃人肉、喝人血的地主、資本家們，残酷地剝削和压榨工农群众的血汗，催租逼債、搶男霸女，騎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，逼得劳动人民挨餓受冻、行乞討飯、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。我們的老一代，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同

反动階級进行了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。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打倒了万恶的反动统治階級，当了国家的主人。

在社会主义社会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，有很多人不了解旧社会的黑暗，没有亲身经历过严酷的階級斗争，不懂得革命胜利果实来之不易；也有很多人还没有真正懂得什么叫階級、什么叫压迫、什么叫剥削、什么叫革命。因此，对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階級斗争，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，缺乏明确的認識和必要的思想准备。通过这些回忆材料，可以获得大量有血有肉的階級斗争的感性知識。对于青年人来说，看一看这些回忆材料，又有其更加重要的意义。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目 次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辛酸的一頁 | 1 |
| 苦難的二十一年 | 13 |
| 我的童年 | 28 |
| 我們哥倆 | 42 |

辛酸的一頁

全國勞動模範、蛟河煤礦副礦長 宗希云

吃人的舊社會，用皮鞭和刺刀給我家祖祖輩輩譜下了一部血淚斑斑的歷史，老一輩一代一代地傳着這部歷史，每一輩人都希望從自己開始，在這部歷史上記下溫飽與歡笑，可是，留下的卻還是血淚和辛酸……我從父親手中接下了這部歷史，也曾用青年時期的血淚寫上了更辛酸的一頁……。

我的老家在山東省泰安縣留送屯，祖祖輩輩給地主扛活，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。一九二六年冬天，爷爷活活地被累死了，又遇上連年災荒，眼瞅着全家人再也混不下去了，爹一根扁擔挑着兩個姐姐和一卷行李，帶着八個月身孕的母親，撒淚離開了故鄉，沿路乞討，投奔關東。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跋涉，全家來到青島。這時，娘已到了臨盆的日子，怎麼辦呢？停下來吧，哪有我們窮人容身之地？真是呼天天不應，叫地地不靈！臘月初八的晚上，在一座大橋底下，娘生下了我。爹望着雪片飛落的蒼天，心里就像萬把尖刀

在攪着，快要冻僵了的娘把我紧紧摺在心窩里，眼泪也哭干了，脸上冻结了一层冰花。爹看我是个小子，盼着能长大成人，给我起了个名字叫“海成”。我的降生，给全家带来了一线希望，但给一眼望不到头的行程增加了多少困难啊！爹娘核計把鋪盖卷和仅有的一点破烂东西全部卖了，勉强湊够了两张船票錢，一家人坐船来到了大連。数九寒冬，大雪紛飞，寒风刺骨，可怜我們无衣无食的五口之家，投奔哪里去呢？爹的腿冻肿了，走一步三晃蕩，娘的手脸也冻坏了，真是身上无衣怨天寒哪！为了全家人的生活，爹几次狠心要把两个姐姐卖给人家，可娘死活沒答应，自己身上的血肉，怎舍得眼睁睁叫人挖去呢！能活一天，大家一起活一天，要死，全家人也得死在一块。就这样，我們一家人相依为命，沿途乞討，最后总算在朝阳川（延吉县境内）找了个容身之所，又托一位老乡說情，才在地主徐閻王手下租了几亩薄地。吃人的旧社会多么不公平啊！世上的大路小道千万条，就沒有咱穷人路一条。一路千辛万苦，跑了半个中国，还是沒逃出地主的手心。

俗話說：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全家搭了个“地印子”，总算安了个家，娘却由于产后长途跋涉，飢寒

劳累而离开了人世。这时我才一周岁零二十天，大姐只有七岁。娘在嚔气时摸着我的头对爹说：“把孩子抚养成……成……”一句话没说完，就抛下了我们。爹爹拖着我们姐弟三个，日子可怎么过呢？黑心肠的徐阎王，见我大姐长得不错，借口娘死后葬了他们徐家的地，想把大姐拉去顶眼。人家有钱有势，不答应怎么行呢？可哪个做父母的能愿意把自己的骨肉往虎口里送？一天夜里，爹又挑起了我们姐弟三人，悄悄地逃走了。在葦子沟大森林里，遇见了一位姓薛的老猎人，他帮助我们在这老山林里搭起了一个窝棚，实指望在这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，能过几年平静的生活，谁知道吃人的魔鬼们，就连这里也不放松。一九三一年，日本鬼子的铁蹄践踏了东北的土地，为了扼杀人民的反抗，他们带领人马到处搜山，发现了我们，小鬼子硬说我爹是“红胡子”，拿起枪柄就向我爹头上劈来，血不住地往下流着。鬼子还不肯罢休，放一把火把我们的窝棚给烧了。爹只好带着我们又逃到延吉县的金佛寺。

金佛寺也是地主们的天下，爹给王老七家扛活，我七岁就披着麻袋片给一家姓薛的放猪。几十口猪，一个七岁的孩子怎么管得过来呢？有一次放猪回去，

当家的一查，发现少了一头，当场就沒头沒脑地給了我一頓鞭子，还非要我賠猪不可，我們全家只好在黑夜中分头去找，可哪里找得着呢？第二天我又挨了一頓皮鞭，在爹的苦苦哀求下，他才算答应以白干一年活做为賠償。十一岁，我又給王老七当“半拉子”了，說是“半拉子”，实际上是啥活也得干啊，苦难的日子，何时才有尽头！每当晚上，爹摸着遍体鳞伤的身子时，总是要伤心地对我說：“孩子，忍着点吧，端人家的碗，就得受人管哪！”忍着，要忍到哪年哪月呢？

后来，鬼子又实行并村，我們全家又跑到老头沟附近的宝兴屯。我們爷俩給地主张兴汉扛活，一样挨打受罵。

老財的皮鞭再硬，也沒有穷人的骨头硬。苦水里生，苦水里长，苦水里練成了我一身結实的身板。我十五岁的那年，一个姓隋的把头見我体格壮实，就劝我上“东昌公司”（买办资产阶级的煤矿）去当矿工，說那里挣錢多。我心想，老財的气受够了，矿上兴許能好些？就把这件事答应了。沒想到資本家和老財都是一样子玩艺兒，隋把头看我体格壮，一去就叫我給他翻車，連煤一吨来重的鉄車，要用两个人的力量将

它翻倒在煤堆里，这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！一天十几个小时，累的人头昏眼花，汗珠不断，可到头来挣的錢还不够吃饭。无论是地主的田庄，还是资本家的矿山，都没有穷人的活路哇！

“屋漏偏遇連阴雨”。我到“东昌公司”不久，张兴汉（伪自卫团长）硬說我爹私通抗日联軍，要抓他的“劳工”，讓他到三百多里外的老黑山去給小鬼子修工事。这个消息就象晴天霹雷一样打在我的头上。我回到家里，一家人抱头痛哭，一夜也没想出法子来。讓爹去吧，那是明摆着的，九死沒有一生，爹想托王老七（保长）說个情，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，反把爹毒打了一頓，还恶毒地說：“不去？說得容易，你拿得出錢来嗎？哼！”錢，不就是錢嗎？！我不能眼瞅着爹去送命，就是自己下火海也不能讓爹去当“劳工”。我一狠心就到小鬼子統治的“紅坑”（煤矿）去卖了劳工，弄来了三十元錢，把它交給了“自卫团长”张兴汉，爹的“劳工”才算免了。真是“有錢能使鬼推磨”呀，这算什么世道！爹知道这件事后，死活也不放我去“紅坑”，两个姐姐也在一旁哭着，可是使了人家的錢还能不去嗎？我狠了狠心，走了。

“紅坑”当时掌握在日本人手里，是一座人間地獄。

沒有亲身經歷過的人，很難想象當時“紅坑”工人所遭受的苦難。我到了“紅坑”以後，才漸漸領會到這“人間地獄”的全部含義。新到“紅坑”的勞工，第一關就是上“老虎系”（勞務系）去審查登記，小鬼子把我們的衣服全部扒光，給換上一套麻袋片做的所謂的衣服，又把每個人編好號，用一個木牌挂在脖子上，這木牌上的號碼，也就代替了每個人的名字。輪到檢查我時，一個鬼子問我：“你的什麼人？”這还用問嗎？我說：“中國人。”誰知道就因為“中國人”這三個字，小鬼子左右開弓地打了我十幾個嘴巴，血順着嘴角直往下淌，兩眼直冒金花。小鬼子剛住手，又問：“你的，什麼人？”這時，我已被打懵了，仍然回答“中國人”，招來的又是一頓毒打，一連幾次，我被打得昏了過去。從“老虎系”出來，我就被帶到“三番地”（即大房子），那兒哪是人居住的地方呀，五六百人擠在一間又濕又黑的“地印子”里，谷草就是被褥，磚頭當做枕頭，面黃飢瘦的礦工，赤身露體地擠滿一炕。面對這樣的情景，我的眼淚就不由自主地涌了出來。老工人看到我這麼年輕就來到這人間地獄，都非常同情我。一位姓秦的老工人指着身旁一個勉強能容下個身子的空位對我說：“你就躺在这里吧，可憐的孩子。”可是我做夢也沒有想到，

我躺的那个地方，住的是一个老工人，因病重不能干活，就被把头們活活拉出去埋掉了。弄死矿工一条命，在这里比杀死一只鷄狗还容易！“紅坑”的周圍密布着电网、崗楼，在这里要想逃跑是比登天还难的。

到“紅坑”当天的半夜，我就被把头赶到井下去了。那时的矿井，哪里是人呆的地方呀，通风設備不好，里面臭味冲天，連呼吸都困难，怎么还能干活呢？看到老工人一个个都光着膀子，赤着脚，艰难地刨着煤，我心里一陣一陣发紧。一个姓曹的二把头見我楞着，劈头就是一鎬把，我只觉得眼冒火花，站立不穩，幸好一个老工人把我拉了过去，才算免遭毒打。那时采煤，哪里象現在还有这个机那个机的？每一个煤块都得靠矿工們用血汗去換取啊！我們用煤背子背着一百五十多斤重的煤，右手拄着一根棍，左手提着一盞矿灯，弯着腰，一趟一趟地往井口运送……井下的十几个小时生活，就像过了几年一样，实在难熬。劳累了一天，总該吃飽肚子才行吧，可小鬼子哪把中国人当人看待？我們每天吃的是橡子面，不少人因为吃了不能消化而被漲死，可小鬼子却說：“中国人大大的有！”人死了往万人坑一扔就算了事，新的劳工又一批批的被抓进来。

一九四三年，正是小鬼子垂死掙扎的時刻，他們離滅亡越近，對待礦工也就越狠毒了。當時的礦井，哪一天不流工人的血啊！礦里設有兩輛大車，專門往萬人坑拉死人。有一次，我們工作的掌子的情況十分危險，大家正在商議對策，曹二把頭領着幾個鬼子來了，小鬼子一看我們在巷道里站着，罵了一聲“八格牙路”就用皮鞭亂抽起來，我們指着正在掉渣的掌子對鬼子說有危險，一個小鬼子鬼頭鬼腦的伸着脖子朝掌子頂上看了一眼，好象怕被什麼東西砸死似的，連忙退到一邊，喝令曹二把頭去檢查。曹二把頭只好拖着兩條腿爬上掌子面，慌里慌張地看了一眼，連忙退下，一跳回到巷道，他的精神又來了，揮動着鎬把對我們喝着：“還不快上，掌子沒問題。”這時，只見掌子頂也不掉渣了，死一樣的靜，這是即將冒頂的信號。小鬼子見我們都不動彈，皮鞭、大鎬沒頭沒腦地打將下來，這時有的工人被逼進了掌子。我把心一橫，使出全身的勁，舉起鍬對準身旁鬼子的腦袋掄去。站在我後面的曹二把頭狠狠地給了我一鐮頭鉤，我還沒明白過來，只聽得轟的一聲巨響，一股壓人心肺的氣浪把我掀出老遠。我醒過來時，看看四周沒有一個人，小鬼子早就屁滾尿流地吓跑了。我的手上、腿上淌的鮮血



与煤面子凝聚在一起，直到現在我的肉皮里面还留下长长的一条黑色的痕紋。我支撑起来，爬近掌子旁一看，只見黑紅的血水，順着掌子面往下淌着……我們中国煤矿工人的生命，就这样一批一批地断送在小鬼子的手里。

小鬼子越是疯狂，我們矿工的反抗也就越激烈。当时，在我們工人中，还有一批“特殊工人”，他們有的是八路軍战士，有的是地下党员。小鬼子对他們更是严加戒备。他們干活时，还得帶上沉重的脚镣，但他們的意志却永远是那样的刚强，敢于和鬼子、把头做面对面的斗争。鬼子不敢讓这些人自由活动，把他們和我們隔开，不許接触。但是，他們的行动却对我們产生了强烈的影响。我心里常想，要学“特殊工人”那样，跟小鬼子斗争到底。小鬼子越是想多出煤，我們就越不給他干活。鬼子給我們每人規定了一定的任务，一車煤挂一个牌子，工人推煤上井后，自己把牌子送到一个指定的箱子里，这样鬼子就可以在井口查牌子，誰的牌子不够不許誰上井。我就想出了一个办法，把大家的牌子都收起来，揣在怀里，跳上絞車跟上井口，偷偷地把大伙的牌子放进箱子里。虽然跟着絞車上井口随时都有生命危險，但只要能胡弄鬼子，

我什么也不怕。这样干了几次都很成功，我就放心大胆地干开了。不料有一次刚把牌子放进箱中，就被一个鬼子发觉了，他举起鞭子就打，把我身上穿的麻袋打成了碎片，浑身被打得没有一处好肉，要不是老工人照顾，我这条命也就完了。

小鬼子的末日终于到了。一九四五年八月，鬼子投降的消息，象风一样在老头沟煤矿工人中传开了。小鬼子正想夹着尾巴逃走，“特殊工人”一声号召，矿工们的革命怒潮再也遏制不住了，大家举起大镐、铁锹，跟鬼子、把头展开了殊死的搏斗，消灭了“红坑”的小鬼子，烧了他们的仓库，打开大门，迎来了救星共产党。

这些年来，对我的这页血泪史，我未曾淡忘过。俗话说，吃尽苦中苦，方知甜中甜。每看到今天我们矿工的社会地位和幸福的生活，我浑身是劲，感到自己为人民、为党做得太少了。而党和人民却给了我极大的荣誉，我曾两次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出国访问、十次上北京、五次见到了我们伟大的、亲爱的领袖毛主席。当我第一次见到亲爱的毛主席并和他老人家握手的时候，我是那样的激动，抑制不住热泪，内心里翻腾着千言万语，归宗一条：我要永世跟着党、跟着毛主席，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，把革命事业进行

到底。

我常常想，我們的事業，還要傳給我們的子孫后代，而我們的孩子，在新社會長大，他們沒有嘗過老一輩的辛酸，給他們述述這一血淚寫成的家史，叫他們知道今天的幸福來之不易，知道在帝國主義和地主、資本家統治壓迫下老一輩所受的苦難，是會有很大的好處的。

(田塞、紀原整理)

苦难的二十一年

魏 本 厚

我今年三十八岁。在旧社会生活了二十一年。这二十一年，我受过封建地主、封建把头、资本家、日本鬼子的残酷压榨和剥削，饱尝了人世间的血泪辛酸。

童 年

我的老家是河北省冀县北安成村。我生下来刚两个月，父亲就因给地主扛活累死了。母亲拉扯着我和姐姐，起早贪黑地给地主纺线，挣点谷糠、棉花籽什么的，对付着生活。我五、六岁的时候，就跟着姐姐下地挖野菜、剥树皮了。

生活实在难熬啊。万般无奈，妈妈就让刚满十七岁的姐姐出阁了。

姐姐出阁不久，我有个在天津做工的本姓哥哥回来了，他见我生活困难，就和母亲商量：“嫂子，看你们娘俩这个样子，面黄肌瘦的，本厚也不小了，我

把他領出去闖一闖，闖好了，把你老人家也接去。”母親一口答應了。我却噘着嘴對母親說：“我不去，剩你一個人在家沒人照料。”“去吧，孩子！別再走你爹的老路了！”母親含着眼淚沉思地說。

為了不讓母親傷心，我答應去天津。幾天後，母親把姐姐找回來，給我改做了一套舊粗布衣服。

第二天，母親和姐姐擦着眼淚把我送出家門。母親拉着我的一隻手，再三囑咐：“孩子，放心走吧，你姐姐會照料我的。到了天津，在工廠里好好幹活，掙下錢就回來接我，那時候咱就得好了！”

到天津的第二天，我就被介紹到一家帽鋪當學徒。說是學徒，其實哪是什麼學徒啊！天不亮就起來給人家端尿盆子、打水、掃地、擦桌子；然後再去一個個地招呼人家洗臉；這些作完了，就得去給女掌櫃的看孩子。一有不順他們心眼的地方，就得挨打挨罵。

半年後的一個晚上，已經十一點多了，掌櫃的還讓我到鍋爐房去挑爐灰。因為睡得少，活又累，我挑起灰筐剛走出屋外，就晃晃蕩蕩地摔倒了，趴在地上，只覺得眼前發黑，天旋地轉。這時候，胖掌櫃的狠狠地踢了我一脚，破口大罵：“媽的，不想幹了！明天把保人找來，算算飯錢，給我滾蛋！”說着，還打了我一

頓藤棍，打得我可地直滾。

第二天早晨，女掌柜的突然改变了生活規律，早起了一个鐘头。这时我还没有醒来，她便在楼上沒好气地叫喊：“魏本厚，几点鐘了！尿盆子也不倒，你想薰死我呀！”我惊醒了，急忙往楼上跑。刚跑上楼梯，女掌柜的就一把扭住我的嘴巴，罵道：“你他媽可享福！”我的嘴巴被抓破了，心里又气又恨，真想咬她一口。我狠狠瞪她一眼，尿盆也沒端就下去了，心想，你爱咋的就咋的。”

那會想，这下子可惹出事来了。吃早飯的时候，我刚端起飯碗，掌柜的就白了我一眼說，“沒給你預备飯”，我挨了一頓餓。下午，还是照样沒有我的飯。这回我可火了，心想，“去你媽的吧，給我吃我还不吃呢。”趁他們不注意，我就悄悄地溜走啦。

馬路上，人来人往。可是，我上哪去呢？到了晚上，我躺在楼簷下，翻来复去，总是想着离家时母亲的話：“孩子，到了天津，在工厂里好好干，掙下錢就回来接我。那时候咱就得好了！”可是，我掙了什么呀？

被 騙

逃出帽鋪的第六天中午，我正在馬路上要吃的，

迎面来了一个戴礼帽的人。这人问我的来历，我一五一十地说了。他笑呵呵地说：“小孩，我可怜可怜你，给你找个吃饭的好地方，保你有吃有穿有钱花，还可以回家看母亲。”我一听，可乐坏了。心想，这回可碰上运气啦。

我跟着那人转弯抹角地进了一个大院子。门口坐着一个满脸横肉的瘸子。领我的那人向他一呶嘴，喊了一声“又一个……。”

瘸子把我推进大门，当的一声又把门关上了。我进屋一看，躺着的，坐着的，满地是人。墙角放着便桶，那股味真叫人恶心。

有几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大孩子，凑到我跟前，问我从那儿来的，怎么来的。我就告诉了他们。其中有一个说：“坏了，我们受骗了！”当时我还满不在乎地说：“管他呢，能吃饱肚子到哪儿都行。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一个人吆喝着大伙排成队，把我们一百三十多人押上了闷罐车。

到山海关，下了车，又把我們赶进一个大棚子里。把头們又叫我們站队，脱掉衣服。日本人就在每个人的胸膛上盖一个大红印，还照了象，最后发给一个不知是“劳工証”还是“出关証”之类的玩艺兒，就又

把我們押上了火車。

記不清悶了几天，最后來到西安（現遼源市）。一下火車，就有兩輛帶黑棚子的汽車，把我們拉上一個光禿禿的山丘，停在兩棟大房子跟前。大房子由兩層鐵絲網和一層電網包圍着，門口，站着兩個拿木棒子的人，氣勢汹汹。我心想，這不是一座監獄嗎？

我們却被押進了大房子。進屋一看，南北兩個通天炕，炕上橫七豎八地躺了不少人。有的人枕着一塊磚頭，有的人蓋着一塊破棉花套，有的人披塊麻袋片，頭髮長的老長老長。我心想，這到底是些什麼人？什麼地方？讓我来干啥呀？

虎 口

原來，這兩棟房子就是方家櫃的工房子。方家櫃是偽西安礦上一家最大的櫃頭，我們是被騙來給方家櫃出苦力，下井挖煤的。

方家櫃猶如老虎口哇！

到方家的第二天，我們一起來的人，大清早就被轟起來，到外面站好隊，每人發一個柳條帽，上面歪歪扭扭地印着個紅色的方字，好像一片血跡。

這時候，一個橫眉豎眼的傢伙，吆喝着，“都站好，

检查检查!……”路上发給我的三元錢被拿走了还不算，这家伙看我穿的衣服挺好，就走到我跟前說：“你的衣服下坑不能穿，脫下来我給你保管。”我刚来，不懂“規矩”，就把衣服脫給他了。他順手扔給我一件破烂的棉袄，挟着我的衣服就走了。我接过棉袄一看，上面滿是汗斑和血迹，又腥又臭，刚想回头要我的衣服，那家伙已經走得沒影了。

領工的来了，看样子是个把头，把我們押到飯房，每人一碗高粱米飯，飯里尽是高粱壳和砂子，有人还在飯里发现了死老鼠，結果，这頓飯誰也沒吃好，就被催逼着下了坑。

坑里黑洞洞的，我不敢进。把头在后面敲我一棒子，我还是不进，他就又敲了我一棒子，我才最后一个进去。

因为方家柜的条件恶劣，所以，我很快就病了，渾身发烧，心里难受。上工的第二天，一个班沒干下来就受不住了。下班时，大家扶着我回到了大房子。

第三天清早，大家照样是列队点名。点到我的名子的时候，大家都說：“他病了。”薛把头提着木棍子，闖进大房子，“啪”的一声敲一下炕沿：“你起来不起来？”我說：“我有病，干不动活。”他一把手把我抓起来，

“啪”就是一个嘴巴，打得鼻孔穿血。把我拉出了大房子。大家都帮我說情，薛把头急了，恶狠狠地罵道：“去你媽的吧，你們都是一道貨。快，都給我下井！”

下坑后，一个老工人囑咐我：“你先在小水沟洗洗脸上的血。活，你能干多少就干多少。”我正在弯腰洗脸，过来一个家伙就用棍子捅我的屁股，叫我快去干活。我回头瞪他一眼，又弯腰去洗，这家伙劈劈拍拍就打我几棍子，把我打趴下了。那人刚走，又过来一个家伙，看我一动不动的趴着，就問我为什么不干活，我沒吱声，他又踢我两脚。

这家伙走后，我觉得很憋气，想找个出气的办法。这时候，正有一串“炭車”嘩啦嘩啦地溜过去。我就使出全身力气，爬到前面道叉口，把道叉子从左边搬到右边，就找个隱身的地方躲起来。不一会，又一串“炭車”嘩啦嘩啦地过来，跑到叉路口就“耍龙”了。我怕把头找上来，赶紧溜回掌子面，心里又高兴又害怕。

我来到方家柜以后，柜上从来沒有按时开过工资，他們总是一拖再拖，常常連續几个月不开支。好不容易盼到开支，也是东一笔西一笔扣个淨光。有一个月，我还算不錯，开了三元錢，被一个叫“初大麻子”的把头

看見了，非要拉我去賭錢不可。我早就知道，誰去誰倒霉，光輸不贏。因此，我死也不去。可這以後，這小子就總找我的岔兒。不過，我也沒買他的“賬”。

冬天到了，大櫃上却連棉衣也不發。我凍得受不了，就把從家里帶來的那床小被，在中間摳了一個窟窿眼兒，剛好伸進頭去，出門當棉袄，晚上當被蓋。里里外外，就憑這床小被了。

我在方家櫃干了不到一年，遭了六次險，沒有死。最後一次遇險是在三六八五大場子，剛剛放完炮，掌子面炮煙未散，躡場子的就拿鎬把往里趕我們。大伙剛進去就冒頂了。幾個人當時就被壓在里面，等挖出來的時候，已經斷气了。我的胳膊砸壞了，衣服粘着血，疼得難忍。事後，我們幾個人核計了一下，決定要出這口氣，就把井下放着的一千多個雷管和一些火藥弄到空巷里，一起放個“大炮”。

從此，我的胆子大了。

逃 跑

方家櫃的打罵、壓榨和虐待，實在無法忍受了，我就想逃跑。怎麼跑呢？幾次找同伴小劉商量，都沒想出辦法來。有一天，大櫃上發“水袜子”，這下可把我

們俩成全了，不然赤着脚是跑不动的。

一天夜里，我俩趁炕长熟睡的时候，摸出了大房子，偷偷地从围墙底下一条小水沟鑽出去，一直朝西北边的山上跑去。跑到山上，碰到了一个人。他看出我俩是要逃走，便想在我們身上敲一下子，就向我俩說：

“你們是不是方家柜的？想跑的話就把胶鞋脫下来。”我俩为了急于逃走，把鞋脫給他，赤着脚跑到了三道河子。一个姓刘的地主拦住我們，逼我們給他放牛。又怕我們俩在一起还得跑，就把我送給了一家姓于的地主。

过了七、八天，我們俩又在山上碰着了，真亲热。我俩一核計，扔下猪和牛，又跑了。

天黑洞洞的，我們俩爬山越岭，鑽树林子，簡直是閉着眼睛往前摸。我的脚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，疼的不敢动，就从身上扯一块布片把伤纏住。小刘扶着我一瘸一拐地往前走。走了好一陣子，看見前面有光亮，心想，“这下子可好了，可算到了鉄道綫了。”誰知道，走到近前一看，又走进富国矿了。

將錯就錯吧，况且，再跑我也跑不动了，就領着小刘去找工人出身的炕长王承軒。他偷偷地把我俩安插在一間小屋子里，把門上了反鎖。第二天天不亮的时

候，他就把門打開，叫我倆快跑。跑到市里，我的脚腫得更疼了。我怕連累了小刘，就讓他先走。小刘舍不得扔下我，經我再三催促，才流着眼泪离开了我。

乞 討

小刘走后，我就一癩一拐地到处流浪，馬路就是我的家。

一天，在西市場，我碰上一群討飯的“花子”，我也加入了这个“花子群”。白天，大家分头到各处討飯，晚上，都回到苏家店門前的大窖里。苏家店的老板非常討厭我們，恨我們。但是，他今天把我們攆走，明天我們还来。看看攆不走我們，就打发他的伙計把窖的南头堵死，从北头往里放水。窖里的人，撬开南头窖門往外跑，有些生病的沒来得及救出来的，大概是淹死在里面了。

死逼无奈，我又提着討飯棍，溜达到富国矿附近了。我进机械厂，机械厂的人攆我；我藏到貨堆里，貨場的人攆我。在馬車厂子，我碰上了三个日本警察，看我渾身上下造的这个样子，就盘問我是干什么的，我照实說了。一个鬼子問我是什么人，我說是中国人，他就乒乓打我两个正反耳光。另一个鬼子去打电话，

叫来两个方家柜的人，又把我带回了方家柜。

狼 窝

方家柜将我抓回以后，扔进了“病号房”。“病号房”实际是死人仓库，谁进了“病号房”，那就离死不远了。

但是，工人兄弟們对我照顾得很周到。夜里，他们偷偷地把我背回大房子。大房子条件也很坏，可总比“病号房”强啊。一到白天，炕长还照旧把我扔进“病号房”。由于工人兄弟的关心，经常给我送饭、送药，三个月以后，我的病就全好了。我是“病号房”里的幸存者呀！

刚好没几天，方家柜就把我们卖给了董家柜。

离开了虎口，又陷进狼窝。董家柜，一切都跟方家柜没什么两样，工人兄弟們还是一样受苦受罪。

上第一个班的时候，大伙说我有病刚好，身子受不住，劝我躲一躲。我就跳进坑里，大伙在坑口给我盖上一块板子。不一会，过来了两个把头，一看没有我，就问：“魏本厚哪去了？”大伙说不知道。把头好象看见了我了，一脚踢开板子，使劲往下踹。没办法，我只好爬上坑来。刚上来，把头就给我一拳，骂道：

“他媽的，你們是花錢买的，想要熊啊！”我心里罵：“去你媽的吧，你們还拿我們做买卖呢！”

过了几天，“劳务系”发劳作服——这是十年不遇的事。我想，不管是方家董家，我干了五六年，总該发給我一套新衣服了。我到“劳务系”去領衣服，他們却說，我是从方家柜买来的，不发。一听这句话，我心里实在不是滋味，一賭气，甩手就走了。

斗 爭

眼看着五月节就要到了，董家柜还没給工人开支。大伙想买点米、菜，手里沒有分文。可是，柜上却杀猪宰羊，欢乐的不得了。

就在这时候，一个老工人找我，我們俩又串通了一伙兄弟，拿着鎬把冲进了柜房。那位老工人揪住董把头質問：“你叫我們活不活？你到底开不开支？”董把头一看形势不妙，随口分咐管賬先生开柜，每人“暫借”十元錢，他就抽空跳窗戶跑了。董把头一跑，大家一轟，鬧开了柜房。鍋里的肉，籠里的包子，都讓我們吃了，茶壺茶碗，桌椅板凳，也讓我們砸了。

砸柜房不几天，大伙又砸过一次領灯房。事情是这样发生的。一个工人，在領灯房前苦苦哀求換个好



灯，里面的人不給換，他就說了一句气話。管灯房的人出来，揪住他的衣領就往里拖。大伙一看就急眼了，撿起石块瓦块就打，灯房的玻璃被打碎了，矿灯也砸个希里嘩啦。

日复一日，經理、把头对工人們压迫得越重，工人們的反抗斗争也就越激烈。

※ ※ ※

解放了，我这个“煤黑子”也作了国家的主人，入了党，当了干部。家里的生活也很好，孩子們欢欢乐乐地上学讀書，母亲愉快地渡着晚年。

我常常想，穷苦人在旧社会受苦受难，根子到底在哪？也常常想，我們也沒少和經理、把头們干，可为什么总也沒干出名堂来呢？原来，这里边大有学問，我們受的苦受的难，是階級的苦、階級的难，是經理、把头們也就是官僚买办、封建地主和資產階級硬加在我們头上的。要想摆脱枷鎖，不受压榨，就得起来和他們干，整个階級起来和他們干，并且，不能只看到眼前的一点利益。争取提高工資，按时开支的斗争是必要的，却还远远不够哇！只有跟着党走，站得高，看得远，把經濟斗争和政治斗争結合起来，并且拿起武

器，夺取印把子，才能真正的翻身作主！

作了当家人，就得把家当好。我决心按照党的需要，忘我地劳动、工作和学习，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。

(辽源矿务局“三史”编写小组整理)

我的童年

譚金章

每当我看見孩子們扎着紅領巾、歡歡樂樂地上學，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我的童年。

逃荒，越逃越荒

我的老家是山東省臨朐縣富家裕村。從我記事起，我們家就過着吃上頓沒下頓的窮日子。在我九歲那年，家鄉來了日本鬼子。他們和漢奸隊、國民黨九旅、十七旅勾結在一起，到處抓工要糧，搶東西，燒村莊。村里的人餓死的餓死，逃的逃。我爹和一些年輕力壯的人都逃到山里。有一次他回家被漢奸看見了，漢奸就想抓他，他跑到大姑家躲起來，才脫了險。後來他給家捎信，讓把二姐給人，以便逃出虎口。我娘一聽就哭了。但又沒別的法子，全家只好哭着把二姐送走了。一天夜里，我爹回家用一對筐，挑着兩個弟弟，娘夾着兩床破被領着我，離開了家鄉。

正是十冬臘月，我們一家五口人冒着狂風大雪，

一路討飯，來到離家十里的紙坊集，在那里靠討飯为生。快过年了，財主家有酒有肉，喜气洋洋。我們家連鍋蓋都揭不開，全家哭成一團。后来，我爹拿一个破风匣到集上去賣，轉了好久，換回兩塊碟子大的花生餅，全家才算過了年。

年是過來了，可是日子更不好過，沒吃沒燒，飯也要不着。有一回，我拿着瓢，挨門挨戶去要飯，走到一个汉奸家門前，我還沒開口，就被汉奸踢了个斛斗，瓢也摔碎了。从那以后，娘再不讓我要飯了。我就和爹上山去燒荒草，扫起燒落在地上的草籽，回家碾着吃。每次弄回三、四兩草籽，怎么能够五口人吃呢？全家人照样餓着肚子。眼看着一家人活不下去了。听说益都有招工的，我爹就領全家人走了三天，趕到了益都。

原来是西安煤矿日本鬼子的大把头譚庆池来山东招工。他花言巧語地說：“乡亲们！跟我上黑龙江、牡丹江盖房子去。那兒比山东强，吃的是大米白面，活还不重，挣錢又多。嘿！老乡，人生一世也得見識見識呀！干六个月就送回来，还给十塊錢。”我們都信以为真，跟他走了。

押上悶罐難脫身

把头把招募来的三百多人，集中到一間大房子里看起来了。第二天就把我們押进了三輛悶罐車。他們怕人跑了，車門用小指头粗的鉄絲紧紧擰着。一百多人挤在一节車箱里，拉屎撒尿全在里面，又臊又臭，熏得人透不过气来。車开到张店車站，一个姓张的病倒了。把头看这个人不能給他們干活，就在火車正跑着的时候，把他从車上推了出去。

在济南換車的时候，把头看守的更紧了。把男人和妇女老幼分成两伙，每人发給一个半尺寬一尺长的木牌子，挂在脖子上。給我們照了单身象，象片贴在“过关証”上，証明上写着“华北劳工协会”几个字。另外，每人还发了个白布黑字的袖标，上面写着“西安矿业所”。这下子我們知道受騙了。那时，关里人都說，誰要下井采煤，性命难保哇！但是，我們已經上了圈套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，只好硬着头皮挺着。

晚上，到了山海关，我們又被赶下車。人們都携妻帶女地排一长串走着。走到門口，每人发一个橡子面餅子。我的个头矮，发餅子那个家伙不知为什么打了我一个嘴巴子，餅子也沒得到。回到悶罐車里，我又

气又餓，抱着爹的大腿哭。爹默默地看着我，好半天沒說出一句話來。他把餅子給我和弟弟吃了，他却一天一宿也沒吃到一點東西。

一路上，車門總也沒打開，車上的人連口水都喝不着。有的人受不了，就昏過去了。足足經過三天三夜，才算熬到了西安（現遼源市）。

到西安後，把頭就把我們帶到太信三井。有二十多個“勞務系”的外勤和小把頭凶神惡煞般地監視着我們。大把頭譚慶池也扯下了偽善的面具，耀武揚威地說：“老鄉們，你們要放明白點，西安可比不得家鄉，這裡是日本人的天下。常言說：‘忍為貴，和為高’，遇事可不能太隨便，太任性，應該好好出力。”

晚上，我們這三百多人，都被趕進用鐵絲網圍着的两棟大房子。里面有四鋪炕，破窗戶紙被風吹得嘩嘩地響。人多房子小，擠得人透不過氣來，外面有把頭、外勤晝夜地看守着，不能外出一步。礦工好像犯人一樣，上、下班都有把頭押送。吃的哪是大米白面呀！淨是些發了霉的苞米面和帶殼的高粱米，里邊的沙子多得叫人合不上牙，還有耗子糞。就這種飯食，還不給我們吃飽呢。勞動力一頓給兩小勺，家屬每頓給一小勺。吃得人肚子疼，直拉稀，他們還說山東人

不服水土。

爹爹天天爬煤洞

我爹在太信三井挂了号，领了一双“水袜子”，一个柳罐斗，一把大铁锹，就下井了。因为爹拖带家口，我们也就从大房子里搬出来，住到一个小草房子里了。从此，爹天天爬煤洞，一天挣三角钱饭票，只能买一小碗高粱米，家里只给七两苞米面，还得掺一半橡子面，四口人就得靠这一点点粮食糊口度生。

我爹没日没夜地干，一干就是十二、三个小时，干了一个月，满指望开支几个钱，那曾想，开支时不但一个子儿没得到，还欠了债。管账先生的算盘子一拨拉，什么旅费、安家费、工具费、石炭贷费、事务印刷费、饭票等等扣了一大堆。没办法，我就出去要饭。每天天不亮，就偷偷地爬出铁丝网，到安东街转一天，有时能要到一点残汤剩饭，有时连一点剩饭也要不着。爹和娘商量，决定把家里的两床破被卖掉。可是又不敢明着拿出去，娘就把被拆了，把被面围在我的身上，趁天还没放亮我就爬出铁丝网，到破乱摊卖了六角钱，买回一些烂土豆来。但没吃上几天就吃完了，全家人又断了粮。

好容易又盼到第二个月开支，寻思这回能得几个钱。爹上白班，我拿着爹的手戳代替他去领钱。“劳务系”的门口挤了好多人，吵吵嚷嚷地往上拥。我的个子小，蹠起脚举着手戳，拼着全身的力气才挤上去，突然外勤朝我的手狠狠地抽了一藤条子，手戳被打丢了。这时，“劳务系”一个姓郑的家伙说：“去，去！他妈的，没有名章不给开支！”过几天，爹刻了手戳又去领钱，那家伙又说过了时间，不给开支。就这样，我爹天天爬煤洞，却一连两个月没得到一个子儿。

生活实在没着落了，我娘就给我缝了一个小布口袋拴在腰上，每天偷偷地爬出铁丝网，拣些烂白菜叶子回来糊口。到了开春种地的时候，烂白菜也没有了，就只好去弄些野灰菜吃，吃的我们全身浮肿。人病成了这个样子，活动一下都费劲，哪还有力气干活呢？我爹喘吁吁的，头上冒着冷汗，两腿直发抖，还是得天天爬煤洞。要不然，不但三角钱饭票没了，还要挨催班把头的榔头棍。

有一次，爹正在井下干活，矿灯忽然灭了。矿灯就是矿工的“眼睛”，没灯怎么能干活呢？这时候，有个外号叫吴大棒子的把头走进来，硬说我爹“磨洋工”，不容分说就是一顿大镐把，把爹打倒在地上，一直打

得不能吭声了，他才住手。幸亏被一个工人抢救出来，才沒有惨死在井下。

死尸房里难逃生

从此我爹就病得起不来炕了，三角錢飯票也掙不来了，一家人忧愁得終日啼哭，沒几天，就全病倒了。鬼子把头不但不給治病，还說我們得了伤寒，把我們住的地方用鉄絲网圈起来，說这是“疫病区”，不准通行。我們被关在里面，沒吃沒喝，我三弟就在这个时候活活地餓死了。鬼子、把头一看这种状况，就干脆把我們拉到病栋去了。这哪是活人呆的地方啊！这是一栋四面不透风的死尸房！活人和死尸滾在一起。

五黄六月，死尸房里臭气薰天，蠅子嗡嗡嗡，蛆在死人活人身上爬来爬去。我們全家人病得爬不起来。爹和二弟躺在一鋪小炕上，我和娘躺在地下。我憐得厉害，哭着和娘要肉吃。忽然，从門縫里蹦进一个蛤蟆，跳到娘身边，她一伸手就抓住了，嘴里喃喃地說：“金章，你把它……煮煮，吃点肉吧……。”說完她就嚥气了，手里还攥着那个蛤蟆。我想爬起来，但却动弹不了，只知道哭。再瞅瞅爹，他还一个勁地說胡話，看看二弟，他在一口一口地倒气，不一会兒也死了。拉死尸

的把娘和二弟同其他死人一起拽出去了。我看着抽抽嗒嗒地痛哭。后来，我費了好大勁，才爬到爹的身边。这时，爹睁开那双无神的眼睛，一看娘和二弟不在了，就问：“你弟弟呢？”我一听，就哇地一声哭起来：“我娘和弟弟都死了。”爹一听，眼泪刷刷地流出来。就这样，来煤矿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們一家五口人，就剩了我們爷俩。

在这以后，我爹病得更重了，整天昏迷不醒。一天夜里，风雨交加，死尸房里又哭又叫，真“森”人哪！我紧紧地倚偎在爹的身旁。这时，爹爹又睁开了那双无神的眼睛，用他干枯的手，撫摸着我的头說：

“孩子，咱們全家在山东活不下去，才逃到关外来的呀！誰想到天下到处都一样，关外比山东还可怕。这年头沒有咱們穷人的活路哇！”爹說着就哭了，我也哭了。过了老半天，爹才又气喘吁吁地說：“咱們家六口人，就剩你这条根了。我死了你可要活下去呀！等长大以后，能回山东就回去。給，这件棉袄留給你，別冻着……”說着，他把我拽到跟前，給我披上了那件棉袄。他累得直冒汗，嘴一张一张地喘着，看样子还要說什么，可是什麼也沒說出来就嚥气了。我赶忙把自己的小棉袄脫下来，只給他套上一只袖子。可怜的爹爹，实指

望能逃个活命才来关东，但受够折磨之后就死去了。死后連块破席头都沒攢下。直到現在，我也不知道我爹娘和弟弟埋在哪里。

十三岁下煤窖

全家人就剩我一个了，一天到晚老是哭。把头說：“你他媽哭什么？再哭把你扔进死尸坑里喂狗！”趁他們不注意的时候，我偷着爬出去了，眼望着太信的东山哭喊着。到了晚上，不敢再进死尸房。有时在太信三井的伙房爐旁睡覺，有时就躺在人家的房簷下。白天就去挨門要飯。有一次，我在伙房的爐旁睡着了，被“譚家大柜”的把头看見，他抓住我的头发罵道：“小混蛋，你他媽的不干活，在这里干什么？你說！”我哭着說：“我小，干不动。”“他媽的，干不动？干不动就把你扔狗圈去！”說着，就拽着我的耳朵往外拉。我說：“行，我干活去。”就这样，他們給我一个柳罐斗，一双破胶鞋，一把鉄鍬，我也就爬起煤洞来了。

我穿着爹留下的那件大棉袄，用草繩扎上腰。下身穿着一个姓刘的工友死时留給我的破褲衩子，沒穿几天，棉袄就被从矿灯里流出来的硫酸水烧烂了，天渐渐地冷了，棉袄露着肉，冻得实在受不了啦，就到井

下风門那兒砍麻袋片，用放炮的鋼絲拴着圍在腰上。在一塊干活的工友，叫我去要件衣服。我一走進“勞務系”的門，就對鬼子說：“給件衣裳穿吧，要不我就要凍死了。”他們不理，我只好出來。剛走出十來步，一個姓孔的外勤把我叫回去。我尋思大概能給件衣服。誰知道，剛進門，洋鬼子小田中上來就打我一個嘴巴，把我打一個趔趄，我剛想跑，又挨了一腳，這家伙好象還不解恨似的，順手又拿起笊帚把子，把我打的渾身沒有一點好地方，當時就昏過去了。後來，一個叫王景榮的工友把我架回去了，半夜才甦醒過來。

第二天，把頭、外勤還不讓我歇工。下井以後干不動活，稍稍休息了一會兒，就被鬼子踢倒在鐵道上。

轉眼就到十冬腊月了，天冷得很，漫天飄着鵝毛似的大雪，我凍得縮成一團。有人看我實在干不下去了，就勸我再去要要衣服。我胆戰心驚地邁進了“勞務系”的門，看見洋鬼子正給一個工人發衣服，我也把手遞上去了，這回总算給了一套衣服票，可是還要到催班的楊外勤屋里蓋手戳。狠毒的楊外勤，瞪着紅眼珠子跟我要衣服：“給我一件！”我說：“就這一套衣服，給你一件我不得凍死嗎？”他惡狠狠地說：“誰他媽

的管你冻死不冻死！”說着他就举起手里的榔头棍。唉！那时候矿工不如一条狗，把头打死你，連眼都不眨一眨。我生怕再挨打，就忍气吞声地把棉袄給了他，剩了一条棉褲。这是一条大号棉褲，穿起来褲腰頂到胳肢窩，褲脚拖地。没办法，就到井下砍断一节电綫，剥下外面的胶皮，把褲脚擱到腿肚子上綁住；把褲腰迭下来，用草繩子扎上，上身还得照旧穿着爹爹留下的



的破棉袄。睡覺的时候，就把褲腿退下来，用草繩扎紧，把两腿伸进去，棉褲腰往上一拉，身子往里一縮，就睡在里边。这件大棉褲就成了我的被褥。吃的就更甬提了，不是酸豆腐渣的窩窩头，就是合不上牙的带壳高粱米。吃飯沒有碗筷，把头上戴的柳罐斗

摘下来当碗，用手抓着吃。最可恨的是外勤把头自己当汉奸，还不许别人说是中国人。有一次，我躺在炕上，和一个同伴说话，二把头就气势汹汹地走到我们的跟前，逼我们下炕。他问：“你们喳喳什么？要跑吗？”我说：

“我们唠唠还不好吗？往哪跑还不是……”没等我把这句话说完，他就象要吃人似的，瞪着两只三角眼，非让我们跪下不可，还逼着我俩互相打嘴巴子。我们都是苦难的兄弟，怎么能下手呢？但是，谁不打，谁就挨榔头棍。没办法，我们只好互相打起来，直到我们打得鼻青脸肿昏过去，他才哈哈大笑，十分得意地离开了。

那时候，我们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地下煤洞，鬼子、把头根本就不管我们矿工的死活。有一次，太信三井十号大掌子已经开始冒顶了，碎石头不断地掉下来，但是，鬼子、把头还像催命鬼似的逼着矿工进去扒煤。不进去，他们就打，结果进去十八个人，全被埋在里面了。当时就砸死八个。这种事，当时很常见，哪天都要从井里往上拽死尸。开始，鬼子为了胡弄人，挡活人的耳目，还为死难的矿工钉个六块板的小棺材，贴个名签就叫家属来认。后来，死的人太多了，他们就干脆把死尸一古脑儿推到“万人坑”里。“万人坑”

填滿了就送到“煉人爐”，有一天，一次就煉了三十八個人。

就在這樣的日子裡，我整整熬過了六個年頭。

礦工翻身做主人

一九四七年，西安解放了，礦工的苦日子总算熬出來了。黨領導我們打倒了騎在礦工頭上的封建把頭和外勤，礦工成了礦山的主人。我脫去了麻袋片，換上了礦工服，心裡喜滋滋的，老想笑。

在黨的教育培養下，一九四九年秋天，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。我真正懂得了“過去是奴隸，今天是主人”的道理，處處要拿出主人的樣子。過去嘗夠了大冒頂的采煤滋味，今天我們就要改進采煤方法。經過不斷的研究，我們創造了階梯式的采煤法，一連七、八年沒出過事故。

我從小就被逼着爬了黑煤洞，所以根本不識字。當采煤組長記錄時，用“×”代替人，用“○”代替鍬。但是沒多久，黨就送我去上學念書。並且在組織的幫助下，結了婚，成了家。

十幾年來，我這棵苦水泡大的苗，在黨的培養下長大了。先後當過采煤組長、段長、工會主席，現在

是太信矿一井十三段的党支部书记，并且成了辽源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。多次出席过全国和吉林省的先进生产者会议。这是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。我觉得党给我的荣誉太多了，而我做的还太少，今后，我要更加努力地工作。

(辽源矿务局“三史”编写小组整理)

我們哥倆

刘贵柱

我和弟弟刘永柱，都是通化矿务局的采煤工人。我們兄弟倆的年紀都不大，解放时还是十几岁的孩子。可是，在旧社会受的階級苦比海还深。是共产党、毛主席把我們从苦海里救出来，把我們培养成为新人。

禍不單行

我們的老家是山东省临淄县，祖祖輩輩都是穷苦的农民。爷爷給一个外号叫何狗的地主做佃戶，一年到头不顧死活地干，一家人还挨餓受冻，欠下地主一身閻王債。爷爷六十岁那年，狠心的何狗逼債，把他毒打了一頓，一只手腕被打断了。爷爷一股急火，两只眼睛也气瞎了。

我八岁那年，日本鬼子占了山东，灾祸更大了。鬼子、汉奸、恶霸結成一伙，到处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。今天抓工，明天派粮派款，逼得穷人无路可走。爹被抓去修碉堡、挖战壕，每天早出晚归。家里揭不

开鍋，媽只好帶着我和姐姐，到外面去要飯。那年頭，兵荒馬亂，窮人沒的給，富人黑心腸。有時候跑了三里五村也要不到一口飯。有一回我餓極了，把要來的飯菜抓一把塞到嘴里，媽看見了噙着眼淚說：“孩子，不要吃啊，爷爷奶奶和你弟弟还在家等吃的呢！”回到家里，兩歲的弟弟正哭着喊餓，兩個老人坐在一邊傷心的淌眼淚。媽每次把飯遞給爷爷吃時，他總要把手伸到籃里摸一陣，飯要少了，他寧可餓着，把飯讓給我們吃。光靠要飯哪能塞飽一家人的肚子，我和姐姐又四外去摘些榆樹葉、青楊葉，挖些野菜，把黑水擠出后蒸了吃。七、八十歲的爷爷奶奶，又餓又愁，瘦得皮包骨，躺在炕上只剩一口氣了。

舊社會里人吃人，逼得窮人骨肉分離。眼瞅一家人都要餓死了，爹才一橫心，把姐姐賣給人家做童養媳。一天晚上，他瞞着爷爷奶奶，用一輛小車把姐姐送到壽光縣，賣給了一家姓張的，換了兩斗半糧食。誰知禍不单行，他背着糧食剛進村，就碰上一幫偽軍，這些強盜，硬說爹是倒賣糧食的“經濟犯”，把他捆起來吊在村頭廟里打了一頓，打得渾身是傷。还把二斗半活命糧搶走。

爷和奶看見爹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，又聽說孫女

卖给了人，当时就昏过去。两个上年紀的老人，已經餓得半死，哪里受得住这样的惊吓，倒下再也起不来。两个多月，他們就先后死去了。可怜在旧社会受尽欺压的爷爷奶奶，死后沒有棺材，用破席子裹着抬出去埋了。

下 煤 窖

鬼子、汉奸、恶霸逼得我們在家乡无法站脚，爹挑起一付筐，里面放着一条破毯子和几件破衣服，媽拉着我和弟弟，逃出老家，开始流浪。走一路，要一路，慢慢摸到了益都。一天，有一个家伙凑到爹跟前，說是煤矿上来招工的，他奸笑一下說：“跟我到东北煤矿上去，那里比这好混，住砖瓦房，吃大米、白面，一月一开支，过年还有賞……。”这家伙好話說了一大串，把爹的心說动了，一家人就随他来到东北。

那时，日本鬼子在东北成立了“滿炭开发株式会社”，在石人、砬子、鉄厂等地設了“采炭所”，从各地抓来、騙来成千上万的老百姓，为他們从事奴隶式的采煤劳动。我們走进鉄厂矿，就好象到了一个阴森恐怖的大監獄一样。四周圍着鉄絲网，山頂上修起碉堡。大門口的崗楼上插着膏药旗，日本兵端枪守在那里。

把头把我们带进一座大工房子里。屋里四面透风，两边的大炕上，挤满了人，屋当中摆着锅灶做饭，烟熏火燎，呛得人出不来气。我们就在这里安下家。

到这的第二天，把头就来催我们上工。爹下井挖煤，我在洗煤厂挑土筐。每天要干十二个小时。那时我只有十四岁，是个童工，身子又瘦又小，挑起一百多斤的煤筐，压得我腿肚子直打颤，浑身冒冷汗。监工、把头站在一边，稍微走慢了点，就要挨他一顿榔头棍。

到了冬天，日子更难过了。北风嗖嗖地刮，天嘎巴嘎巴的冷，我上身穿件七孔八网的棉袄，腰上扎一条破麻袋当裤子，光着脚从冰凉的洗煤池里往外挑煤，腿和脚冻得裂开一条条大口子，往外淌血。脚踩在冰冻的雪地上，疼得象猫咬似的。

有一次，我冻得实在挺不住了，就站到火堆前烤烤，被把头的管账先生看见了，他凶神恶煞般地跑上来，骂道：“煤黑子，你敢磨洋工！”接着就使劲打我一嘴巴，我趔趄一下摔倒在地上，把牙磕掉一颗，鲜血从嘴角流出来。我心里恨极了，暗暗地骂：“狗日的汉奸，看你们横行到什么时候。”

在鬼子汉奸的铁蹄下，矿工们过的不是人的生活。

每天吃的是又苦又澀的橡子面和發霉的苞米面，油鹽一點也看不到。晚上往炕上一躺，搭條破麻袋就睡。在這種非人生活的折磨下，爹病倒了。那時候，礦工生病，哪有地方去醫治，只能活活等死。爹發高燒燒得昏昏沉沉，一連幾天沒吃飯。狼心狗肺的把頭三番二次跑來催工，逼爹下井。他威脅說：“腦袋硬不硬，硬就得上工！不上工就送到‘病棟’去。”礦工們都知道，‘病棟’名義上是給工人養病的地方，其實是一個殺人場，把病人抬進去往炕上一扔，就沒人管啦，有的病人還沒有咽氣就被抬到山溝里埋了。窮人護窮人，工人們都对爹說，“‘病棟’可千萬去不得呀！”爹被逼得沒法，只好撐着身子，由呂大叔扶着去上工。到了井下，干了不一會，就一頭昏倒在坑里的鐵道上，腦袋摔破了，血流滿地。幸亏在掌子面干活的工人看見，跑過來把他救起，要是慢一點，礦車一過，爹就沒命啦。

血 債

在日偽統治下的煤礦工人，生命絲毫也沒有保障，日本鬼子和漢奸把頭橫行霸道，隨意打人殺人，死難的礦工不計其數。我的母親就慘死在他們的鐵蹄下。

有一天上午，我和爹都上工去了。八岁的弟弟冒着刺骨的北风，到工房去讨饭，遇上了催班把头。这个黑心狼把穷人当成眼中钉，不分青红皂白，抡起皮带朝弟弟头上抽打一頓，皮带卡子把弟弟的脑袋砍了一个口子，当时就昏过去了。

媽听说弟弟被打伤，連忙跑到那里，一見弟弟倒在血泊里，就抱起弟弟失声痛哭。那个仗势欺人的把头却恶狠狠地說：“快拉走，別臭了这块地。”媽真气急了，她憤怒地說：“穷人也是人，他没惹着你，为啥把他打成这个样子。”狼心狗肺的把头哪有一点人性，他抬起穿着大皮靴的脚，朝媽的身上猛踢了几下，媽的右腿被踢折了。

邻居們把昏厥的媽媽和弟弟抬回家，撕些布条把他們的伤口纏起来。这时我和爹还在班上干活，哪里知道家里出了事。一直到晚上下工回家，进門看見这个惨状，娘几个抱头痛哭一場。

过了几天，媽的伤口大发了，右腿肿挺粗，痛得日夜喊叫，家里又沒有一个錢給她治伤。伤势一天比一天厉害，到后来常常疼得不省人事，水也咽不下去。我和爹被把头逼着还得去上工，不能在家侍候她，只有弟弟守在她身边。

有一天，我正在洗煤厂挑煤，忽然邻居老刘跑去告诉我：“你妈不行了，快回去看看。”我立刻去找把头请假。可是汉奸把头却冷冷地说：“不要紧，别耽误活，收工再回去吧！”我一听又急又气，颤抖得说不出话来。和我一起干活的老陈向把头求情，说了不少好话，把头才勉强地放我走了。到家时，母亲已经奄奄一息，她拉着我和弟弟的手，用微弱的声音说：“柱儿，你们记住妈的仇啊……”我和弟弟跪在妈的面前呜呜大哭，邻居们站在一边也伤心地掉泪。没等到爹下工回来，妈就断气了，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又一颗仇恨的种子，深深地埋在我的心里。

找 活 路

我们在铁厂煤矿的两年多，真好象踩着刀尖过来的。我寻思再不想法，咱们爷三个也保不住命，说不上那天就死在鬼子、汉奸的手里。想来想去，只有一条道：跑。逃出这个鬼地方。可是往那跑呢？我和爹核计多少次，最后打定主意，往葦塘沟跑。这里有山东老乡，兴许能找个出路。一天夜里，我们用块板搭在铁丝网上，趁着月黑头偷偷地摸了出去，一口气跑到了葦塘沟。

我們找到山东老乡徐大爷，在他家住了二天，他又找到葦塘矿的方把头。那时候把头多一个工人，就多一个来錢道，哪有不願意要人的。方把头就把我們收下了。从此，我們又成了葦塘矿的苦役。

天下哪有白烏鴉。葦塘矿也是日本鬼子、汉奸把头的天下，工人照样是被打在十八层地獄里。每天仍然累得腰酸腿痛，吃的仍然是橡子面、发霉的苞米面，住的是柳条編的泥棚子，屋外刮大风，屋里刮小风，早晨起来时，我和弟弟的头发都冻在一起了。

日本鬼子只顧要煤，不管工人死活，井下沒有一点安全設備，掘进三、四十米不給棚子，沒有通风設備，常常发生瓦斯爆炸、冒頂等事故。矿工們下井，就等于冒生命危險。有一次，我爹和其他三个人，看見掌子面有裂縫，往下掉石头，就急忙退出来。可是鬼子监工拿着榔头棍，硬逼着他們进去干，还象疯狗一样叫喚：“怕死的不行，苦力大大的有，死了的沒关系。”把他們硬逼了进去。不一会，真的冒頂了，爹沒来得及跑出来，一下被打翻的矿車扣住，上面压了一大堆煤。跑开的几个工人看爹被埋住了，赶忙跑回来搶救，刨了二、三个小时，才把爹从煤堆里救出来。他的脊骨被矿車挤坏，抬回家整整躺了四十多天，才

好过来。可是从此成了残废，脖子再也直不起来。

矿工们被逼得无路可走，有气难出，就用消极怠工、破坏工具、跑空车、假煤车等法子和鬼子汉奸斗。大家盯着监工、把头，这些家伙来了，我们就干一下，刚一转身，大伙就呆起来。那时有一句顺口溜，“磨洋工，磨洋工，拉屎撒尿三点钟，回来一看没到点，回去再蹲半点钟。”我们用了这些法子，使鬼子弄不到煤。

工人对鬼子汉奸的仇恨，就象上了捻的炸药一样，一点就炸。以后常常发生工人揍鬼子的事。有一次，和我们一起干活的徐忠孝，到火堆前烤烤手，一个鬼子监工看见了，象条恶狗一样厉声嚎叫：“八格牙路，你的磨洋工！”上去一拳把徐忠孝打倒在火堆里。我们在一旁看见了这种情况，大伙都火了，上去按倒鬼子就揍。我的拳头象捣蒜一样打在他身上，真是解恨。把这个鬼子打得嗷嗷嚎叫。等他从地上爬起来时，我们一轟而散，都跑到工人堆里去了。

新 生

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，矿山解放了。党领导矿工们斗倒了封建把头，过去骑在矿工头上的鬼子汉



奸，受到了人民的制裁。那时，我参加了矿山工人糾察队，到处巡查放哨，保护矿山的财产。我弟弟那年十二岁，在葦塘沟参加了兒童团，站崗、唱歌，学文化。受人欺压的日子过去了。我們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。

矿上很快办起职工子弟学校，我弟弟背起书包上了学，我家第一次有了念书的学生。一九四八年，我結了婚，成了家！爹总是乐呵呵的，高兴得閉不上嘴。他常常感慨地說：“孩子們，是共产党、毛主席把咱們从火坑救出来的啊！”由于工作需要，組織上把我調到柞子煤矿，弟弟小学毕业后也参加了煤矿生产，成了一名青年矿工。

过去，矿工的生命沒有保障，早晨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晚上。解放后党处处关心矿工，在矿山确立了安全生产的方針，为矿工創造了各种保健条件。有一年我得了十二指腸潰瘍，党委书记亲自去看我，組織上想法給我治病，还送我到北戴河工人疗养院疗养。要是在过去，我还不得活活等死嗎？

从前我是个睁眼瞎，斗大的字認不得一石，解放后組織上給了我很多学习机会，还送我到工人干部学校学习。現在我已經能够看书看报写信了。

在党的教育下，我明白了过去为什么受苦，找到了苦根。也知道今天为什么这样幸福，找到了甜源。阶级觉悟提高了，生产也特别起劲。一九五六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我的弟弟刘永柱，也在一九五五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在生产上，我只做了自己应做的事情，党和同志们就给我很多荣誉。几年来我被评为通化矿务局和矿上的先进生产者。我心里总觉得惭愧，总觉得做的事太少。今后，我要加倍努力，保持无产阶级的本色，永不忘本，为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。

(陈学文整理)